

# 乔治·爱略特 小说里的进化论思想



罗 灿◎著



*Evolutionary Thoughts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RW2014-10)

# 乔治·爱略特 小说里的进化论思想



罗 灿◎著



*Evolutionary Thoughts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治·爱略特小说里的进化论思想 / 罗灿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5

ISBN 978-7-5130-6801-7

I. ①乔… II. ①罗… III. ①爱略特 (Eliot, George 1819 - 1880) —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36170 号

责任编辑: 陈晶晶

封面设计: 李志伟

责任校对: 谷洋

责任印制: 孙婷婷

## 乔治·爱略特小说里的进化论思想

罗 灿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91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195 千字

ISBN 978-7-5130-6801-7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shiny-chjj@163.com](mailto:shiny-chjj@163.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2.5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 作者简介

---



罗灿，1977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南安普顿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近些年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小说里的科学与技术元素，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主持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多利亚小说里的交通和旅行研究”。

# 前 言

文学与科学的关联近年来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相当的重视。科学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描写、记录科学思想、科学实验和科学结论的科学文献作为一种文本，与文学文本相互关照、相互渗透，也都参与到了社会文化的构建中，因此研究文学作品里的科学元素，又或者研究科学文献里的文学元素，都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维多利亚时代天文、地理、生物、生理、医学、物理等的发展奠定了今天这些学科的主要基础，使人们了解了更多的宇宙奥秘，同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认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科学发现和文学作品都刊登在发行量巨大的杂志和报刊上，还有赫胥黎等作家致力于进行科普工作，以期破除迷信，启发民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敏感的文学家们不可能对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思考。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但与科学家交往，而且亲身参与科学实验，撰写科学文献。乔治·爱略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她的书信和日记中我们发现，她熟识不少科学家，时时研读最新的科学文献，并对这些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选取了维多利亚时代生物科学的标志性发展——进化论——作为切入点，研究爱略特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分析进化论如何渗入她的小说中，并影响其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乃至作家的道德思考和对西方文化的思考。

第一章从最宽泛的科学与文学的关系切入，介绍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研究和普及的基本特点，追溯爱略特与科学的深厚渊源，并简要梳理进化理论的要点和原理以及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深远影响等。第二章主要从达尔文理论中“变化”的观点入手，分析《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讨论爱略特逐步改变的变化观和其对

过快变化的担忧。第三章明确达尔文的进化模式并不含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等人笃信的“进步”，爱略特在小说中不但多次对进化是否带来了文明的“进步”提出了质疑，还对可能出现的“退化”和与“进步”相伴的问题和麻烦表示了担忧。第四章主要涉及爱略特对“自然选择”机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反思。“自然选择”理论强调“机会”和“竞争”在生物进化中的决定性作用，似乎为人类利己主义的自私行为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爱略特充分意识到了进化论可能带来的道德危机，在多部作品中都对利己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第五章从音乐的角度切入，研究爱略特的文学表现和达尔文性选择理论在音乐方面的互文关系。爱略特同意达尔文式性选择的基本观点，但是她并不赞成人类的爱情和婚姻仅仅建立在生物本能之上。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能够超越本能，从音乐中悟到人生的真谛，做出利他的选择。

作为文学家的爱略特对进化论的接受和反思是多方面的。她一方面深受进化论影响，另一方面也对进化论里涉及个人发展和社会道德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许多科学理论在她道德理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渗入到了小说的结构、主题、情节和人物塑造中，是爱略特研究不能忽视的重要视角。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距离论文完成已经过去了五年。出于种种原因，在书稿的修订中，笔者没有收录近些年在维多利亚文学与科学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希望笔者的拙著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学者同人对文学与科学的兴趣，进行更深入和广阔的研究。

罗 灿

2017年4月

# 目 录

引论 .....	1
第一章 维多利亚文学与进化论 .....	13
第一节 生物进化论简介 .....	15
第二节 维多利亚人对进化论的接受和应用 .....	20
第三节 科学理论对爱略特写作的重要影响 .....	24
第二章 爱略特小说中的变化观 .....	33
第一节 变化的观念 .....	34
第二节 《亚当·贝德》中的静态世界 .....	39
第三节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均变模式 .....	46
第四节 《织工马南》的均变世界 .....	55
第五节 加速变化的问题 .....	62
第三章 爱略特对“进步史观”的思考 .....	73
第一节 进化论与“进步史观”的关系 .....	75
第二节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进步”的尴尬与代价 .....	81
第三节 《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里的个人“进步”与社会 “进步” .....	90
第四节 《米德尔马契》对“进步”的质疑 .....	100
第四章 “自然选择”观照下爱略特的道德观 .....	109
第一节 “自然选择”理论对道德的冲击 .....	110
第二节 《仇与情》中的机会主义者蒂托 .....	115
第三节 《米德尔马契》对“联系”的强调 .....	126
第四节 《丹尼尔·德龙达》对英国文明的批评 .....	136

第五章 爱略特对“性选择”理论的超越 .....	146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进化理论 .....	147
第二节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麦琪的困境与抉择 .....	152
第三节 《米德尔马契》中的两种音乐 .....	160
第四节 《丹尼尔·德龙达》里格温德琳的领悟 .....	168
结语 .....	176
参考文献 .....	181
后记 .....	193

## 引 论

乔治·爱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迫于经济压力, 她在 37 岁开始创作小说, 凭借《亚当·贝德》 (“Adam Bede”, 1859) 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The Mill on the Floss”, 1860) 很快就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家。她的笔触生动细腻, 对人性的观察细致入微, 富有哲理, 并且有着深沉的道德关怀, 所有这些都为她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赞誉。爱略特最早的评论者之一达拉斯把《亚当·贝德》称为“第一流的小说”, 认为作者借此就可“跻身艺术大师之列”。(Dallas, 1996: I, 77) 《旁观者》 (“The Spectator”) 上的匿名评论认为, 能够真正进入儿童内心世界的作家为数不多, 对汤姆和麦琪童年的描绘证明, 爱略特在这方面的天分是最高的。(Anon., 1996b: I, 113) 詹姆士 (Henry James) 评论了爱略特的多篇小说, 尽管他从自己的理论角度提出了批评意见, 但始终对女作家表达了由衷的景仰, 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强烈的美”。(Edel, 1956: 35) 虽然爱略特的声望在死后有所下降, 但自从利维斯 (F. R. Leavis) 在《伟大的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 1948) 一书中将她列入小说大家重点讨论后, 爱略特作为“伟大的传统”中经典作家的地位就确立起来了, 而且一直是英语文学批评的热点。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 评论者将爱略特的生活和创作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联系起来, 研究爱略特与女性主义、帝国主义、哲学以及音乐等的关联, 出版了不少饶有兴味的著作。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惠特米耶 (Hugh Witemeyer) 的《乔治·爱略特与视觉艺术》 (“George Eliot and the Visual Arts”, 1979), 韦尔什 (Alexander Welsh) 的《乔治·爱略特与讹诈》 (“George Eliot and Blackmail”, 1985), 格雷 (Beryl Gray) 的《乔治·爱略特与音乐》 (“George Eliot and

Music”，1989）等，都为研究爱略特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在这类跨学科研究之中，爱略特与19世纪科学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其中的显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了爱略特小说中的科学元素，并对此褒贬不一。赫顿对《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中充斥着科学术语和行话的“唬人风格”（high-scientific style）提出了批评（Hutton, 1996a: I, 277），认为文中有太多“炫耀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知识”的内容。（Hutton, 1996b: I, 280）他对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中用“动态的”（dynamic）一词来描述格温德琳的美貌也表示了不满，认为“太过科学化”了。（Hutton, 1996c: I, 363）塞恩斯伯里也持相似观点，从《丹尼尔·德龙达》中找出了很多他不以为然的科学词汇，如“激起感情的记忆”（emotive memory）、“像癌的罪恶”（cancerous vice）等。一方面他承认很多此类表达“足够恰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诸如此类的心理学专业词汇出现在小说中是“放错了地方”。（Saintsbury, 1996: I, 367-368）

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科尔文却将科学元素视为爱略特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爱略特的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她的“观察、想象、同情、机智和幽默……都浸透了现代思想，每一个词都十分到位地表达了时代的意识”。科尔文指出，如果说科学思想注定要统治世界，那么爱略特的做法就是完全恰当的，她在用科学术语描绘市井生活方面堪称同时代文学家的典范。（Colvin, 1996: I, 314-315）在1876年的另一篇文章中，科尔文盛赞爱略特能够深刻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理论，使它们成为其艺术的“道德基础和理智基础”。（Colvin, 1994: 13）詹姆斯也试图为爱略特“采用科学的解释”进行辩护。（James, 1996c: I, 524）他借西奥多拉之口评论《丹尼尔·德龙达》说：“她（爱略特）是个伟大的文学天才，……怎么能太过科学化了呢？她不过是浸透了她所生活的时代的最高文化罢了。”（詹姆斯，2009：342）

在早期批评中，对爱略特最有力的辩护莫过于美国女作家沃顿在19—20世纪之交的评论。沃顿发现，很多评论家认为爱略特太过“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她的文学想象力和写作风格。有人搬出达尔文作为例子：因为达

尔文后来宣称他对莎士比亚失去了兴趣，这也就等于说，科学思维与文学想象之间是相互干扰和彼此排斥的。沃顿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是达尔文有过这种说法，我们也应当把他的话放到特定语境中去理解，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科学研究对文学想象力有负面作用的结论。她还认为，对生活中的现象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式，科学家固定的研究目标和有限的调查研究与有文化的普通人对科学鸟瞰似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沃顿将爱略特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爱略特不过是众多有文化的普通人之一，她与其他人，例如丁尼生等作家的区别只是掌握科学的“程度”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而丁尼生曾说科学扩展了他的文学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沃顿在评论中肯定了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相似之处，声称“没有人能否认进化思想的诗歌价值”，“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学假设”与文学比喻一样，“都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大胆与美感”。科学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有想象力的参与，使用的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的方法”。最后，沃顿以歌德、弥尔顿等人为例，指出他们同样把科学融入文学作品中。她质疑爱略特之所以受到诟病，不是因为她在小说中使用了科学术语和思想，而是因为她是女性，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Wharton, 1996: 53 - 54）作为颇有成就的女作家，沃顿这段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评论有力地反驳了评论界长期以来对爱略特的偏见和歧视，肯定了爱略特的勇气和洞察力。

早期的评论家虽然对爱略特小说中的科学元素或褒或贬，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帕里斯（Bernard J. Paris）的《生活中的试验》（“Experiments in Life”，1965）是这方面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帕里斯试图从当时的文化氛围出发考察爱略特的思想，研究这些思想与爱略特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分析她对人的本性、价值观以及命运的看法。帕里斯对科学的解读，尤其是对实证主义的解读，对于我们讨论爱略特对科学的理解和运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帕里斯研究的启发下，很多评论家都发现了科学在爱略特小说中的独特地位。“爱略特因为一度被认为有迂腐的‘学究气’而受到贬抑，但所有这些新近的研究都改弦易辙，高度评价了爱略特渊博的学识，并对这位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先贤大力赞扬。”（Blake, 2001: 215）

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塑造了医术高明并有着先进思想的利德盖

特医生，这使这部小说的科学元素尤其引人注目。休姆将《米德尔马契》称为“科幻小说”（science - fiction，因休姆论文讨论的是小说里的科学知识，故笔者认为应译为“科学小说”），从语言、意象和小说结构出发分析小说如何体现了作家对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熟稔，分析利德盖特与卡苏朋等角色的特点，并重点提到了刘易斯和斯宾塞等多名科学家的理论。（Hulme, 1968: 36 - 45）斯科特主要讨论了爱略特在小说中对实证主义的接受和质疑。孔德曾预言商人和科学家在未来会紧密结合，尤其是银行家和医学家的联合是未来的趋势和希望。斯科特认为利德盖特和布尔斯特罗德的形象与这种学说有一定关系，但爱略特显然并不看好他们的合作。与孔德不同，爱略特对未来持有“更保守，也许更悲观的”观点。（Scott, 1972: 64）同样是研究利德盖特的重要性，麦卡锡论证了利德盖特的医生形象在英国文学上的新意。麦卡锡指出，利德盖特之前的医生在小说中或是处于边缘地位，或是其行医生涯不是重点。而在《米德尔马契》中，利德盖特的职业和抱负却是小说的重点之一。爱略特将他与维萨里、比夏、布鲁萨等伟大科学家，以及医学改革家韦克利等人联系了起来，麦卡锡认为这种处理大有深意，反映了19世纪的重要特征，也即“科学的原则是普遍可行的”（McCarthy, 1970: 808）。另外，麦卡锡也讨论了刘易斯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对爱略特的重要影响，认为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利德盖特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而是作家对科学的兴趣，以及科学研究最新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

1975年，格林伯格在《血管丛与神经节：〈米德尔马契〉中的科学典故》（“Plexuses and Ganglia: Scientific Allusion in *Middlemarch*”）一文中详尽分析了小说中提到的科学家詹纳、维萨里和盖仑等人的成就与利德盖特的研究之间的联系，认为他们都从“结构”出发进行研究，了解他们的工作能帮助我们理解组成《米德尔马契》结构的“重要构造”和“千百个小过程”。（Greenberg, 1975: 52）评论爱略特对结构的重视的论文还包括坦博林的《〈米德尔马契〉、现实主义与临床医学的诞生》（“*Middlemarch*, Realism and the Birth of the Clinic”）。坦博林运用了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科学哲学的发展理论，重点论述了比夏对利德盖特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及作家对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与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的强调。（Tambling, 1990: 939 - 960）

利德盖特所支持并实践的医疗体系改革也受到了评论者的关注。福斯特认为，医疗体系改革是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小说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重要。这种医学改革既包括在医疗实践中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和处理，也包括改革整个医疗体系，对医生重新进行分类和定位。从这一点出发，福斯特分析了利德盖特与其他医生矛盾的根源，以及他事业失败的真正原因，并认为掌权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利德盖特，这恰好证明他倡导的医疗改革十分必要。(Furst, 1993: 361)

在爱略特与科学的众多研究中，爱略特作品中的进化论思想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进化论在19世纪的科学和文化思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奠定了当今生物学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进化论的有些观点也仍然是未经科学证实的猜想，但这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人们对之进行讨论的热潮，乃至出现了“达尔文产业”。对达尔文主义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进化论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研究是这股热潮中的一个方面。

1974年，K. M. 牛顿的论文《乔治·爱略特、乔治·亨利·刘易斯和达尔文主义》(“George Eliot, George Henry Lewes and Darwinism”)明确将爱略特研究与达尔文理论结合起来。牛顿驳斥了一些认为达尔文对爱略特几乎没有影响的观点。(Newton, 1974: 278 - 293) 佩卡姆曾断言：“没有迹象表明《物种起源》曾经让丁尼生……纽曼或者乔治·爱略特感到不安。”(Peckham, 1959: 28) 著名评论家哈维也认为，“如果《物种起源》对她(爱略特)的创作想象力有什么影响的话，也不可能比重演论(recapitulation)的影响更大——不过是让她对一些具体的意象有了清晰明了的认识而已。”(Harvey, 1970: 157) 牛顿则认为，爱略特和刘易斯虽然有所保留，但基本接受了达尔文理论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the Radical”, 1866)和《丹尼尔·德龙达》中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人物形象，认为爱略特对“自然选择”带有抵触情绪，这一理论促使她更严厉地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Newton, 1974: 278 - 293)

科斯莱特在《“科学运动”与维多利亚文学》(“The ‘Scientific Movement’ and Victorian Literature”, 1982)一书中将进化论作为她所要讨论的“科

学运动”的代表进行了分析。科斯莱特没有具体谈到进化论的定义和内涵，但她认为，进化论为“讨论维多利亚科学自然主义的道德和美学含义”提供了“好的聚焦点”。(Cosslett, 1982: 11) 科斯莱特在书中分析了丁尼生、爱略特、梅瑞狄斯和哈代的作品，认为“渐变论”(Gradualism)是爱略特小说的主要原则和基调。科斯莱特认为，爱略特人物的命运主要不是由突发事件，而是由一些日常点滴小事的累积所造成的。科斯莱特还重点论述了科学想象力的特点和重要性，并借此分析了利德盖特、罗莎蒙德与卡苏朋等人的问题所在。科斯莱特只评论了《米德尔马契》，虽然她的分析较有见地，但篇幅过短，尤其因为她只是把进化论当作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思潮的代表比较笼统地谈及，并没有明确进化论具体有哪些内涵，因此对爱略特小说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及，并没有展开论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在有关爱略特与进化论的批评中，剑桥大学教授比尔的《达尔文的情节》(“Darwin's Plots”)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该书自1983年问世以来即被奉为经典，分别于2000年和2009年修改再版，其中2009年第三版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的纪念版，可见该著作不仅是文学研究的经典，而且也是达尔文研究的经典之作。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文在该书第二版前言中写道，达尔文“是个作家”，对“现代文学的语言和意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看来，《达尔文的情节》是把达尔文作为作家的研究中“唯一不可或缺的”一本书(Levine, 2000: xi)。与其他达尔文研究不同，比尔的研究从达尔文的语言入手，细致地分析了达尔文的语言如何体现了思想的张力，讨论了其思想的多义性和开放性。比尔将达尔文的著作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并非要否定达尔文理论的科学价值，而是强调了其文化含义。达尔文的语言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要理解达尔文的科学理论，莱文指出，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语言做了什么贡献，它如何唤起了抵抗，又如何使屈从成为必要”(Levine, 2000: xxi)。这种研究除了告诉我们达尔文理论的内容，还揭示出达尔文是如何进行写作的，以及他的作品是如何被读者解读的，对我们理解达尔文理论的文化影响非常有帮助。在对爱略特的分析中，比尔谈到了达尔文对爱略特可能的影响，以及二人对结构、对想象力的重视，尤其是分析了达尔文理论对有机物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网”的强调在

《米德尔马契》中的表现。(Beer, 2000: 156) 比尔指出, 一些词汇和古老的话题, 如求爱、婚姻、女性的美貌、男性的统治及继承权问题等, 都在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871) 发表之后有了新的含义。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 并表达了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不同的观点。

沙特尔沃思的《乔治·爱略特与 19 世纪科学》(“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1984) 从科学入手比较全面、完整地分析了爱略特的所有小说。该书按出版的先后顺序对爱略特的小说逐一进行了剖析, 考察作家在不同时期对科学理论的接受和反思。尽管名为《乔治·爱略特与 19 世纪科学》, 该书并没有涉及许多科学理论, 而是以有机论为中心, 相当多地谈到了 19 世纪的生理学理论。沙特尔沃思的目的是要“去探索 19 世纪有机论中的重要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也要去论述乔治·爱略特如何通过运用科学理论, 在自己的叙述中对有机社会隐喻 (the organic social metaphor) 所关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 (Shuttleworth, 1984: xiv)。沙特尔沃思认为, 早期的爱略特与博物学家类似, 更多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观察者, 其笔下《亚当·贝德》里的世界基本呈静态, 对社会现状也基本持肯定态度; 而后期随着对孔德和刘易斯的理论的接受, 爱略特越来越多地站在试验者的角度来应对各种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甚至在《丹尼尔·德龙达》中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抛出了激进的假设。沙特尔沃思主要从有机论的角度涉及进化论的某些方面, 尤其在分析《亚当·贝德》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两章中涉及不少进化论问题, 对本文的启发非常大。沙特尔沃思认为, 在《亚当·贝德》中爱略特认可一个“不变的等级社会的理想”, 而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物种起源》面世后爱略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里作家显然运用了达尔文理论中有关变化、生存斗争和适应等概念来审视社会变迁。(Shuttleworth, 1984: 50) 沙特尔沃思认为, 从整体上讲,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一个赖尔式均变论 (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出发点) 的寓言, 但小说结尾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洪水却意味着, 在爱略特看来, “说到底灾变论是正确的” (Shuttleworth, 1984: 63)。沙特尔沃思的这一论断在 11 年后受到了史密斯的挑战。在《事实与感觉》(“Fact and Feeling”, 1994) 一书中, 史密斯认为, 《弗洛斯河上

的磨坊》是一部“深刻的均变论”作品，“有意识地颠覆了灾变地质理论和自然神学”。(Smith, 1994: 9) 史密斯认为，洪水并不是如前人所分析的那样很不自然地突然出现在小说结尾，而是在不少章节中都有铺垫，应该被纳入均变的整体模式之中。

在《乔治·爱略特与赫伯特·斯宾塞》(“George Eliot and Herbert Spencer”, 1991) 中，帕克斯顿探讨了维多利亚科学特别是进化论观照下的女性问题。该书追溯了爱略特与斯宾塞的交往，按照时间顺序考察爱略特对斯宾塞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理论的反应。帕克斯顿强调指出，今天的评论者需要明白，“进化理论对当时的女性知识分子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像爱略特这样认为维多利亚科学“能够促进对世界更精确理解”的女作家而言，进化思想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Paxton, 1991: 5) 帕克斯顿认为，爱略特虽然接受了斯宾塞进化理论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后期斯宾塞理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歧视女性的特征，爱略特在性别、生殖和母性等问题上均进行了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反抗。例如在母性问题上，斯宾塞认为母性完全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爱略特却认为母性是一种从文化中获得的思想感情，并不是盲目的生物本能，母性也是女性潜在的文化和道德影响力的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评论家们纷纷将爱略特的女性主义思想放在维多利亚科学的框架内考察，《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女性音乐家，1860—1900》(“Women Musicians in Victorian Fiction, 1860—1900”, 2001) 《天使之音，颠覆之歌》(*Angelic Airs, Subversive Songs*, 2002) 都不约而同地涉及了进化论对音乐的研究，并结合爱略特小说中的相关人物与情节进行了分析。《调情者的悲剧》(“The Flirt’s Tragedy”, 2002) 也从“性选择”理论出发，探索调情这一现象的生物学根源，讨论了爱略特的女性主义思想。

这些研究表明，评论界已经比较充分地意识到了进化论在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与爱略特写作生涯的密切联系。这些研究或将进化论放在19世纪科学思潮里进行审视，或从进化论的某个关键点出发，或研究爱略特与进化论者的交流与互动，也用当代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进化论，并结合文本对爱略特的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这些努力拓宽了进化论研究和爱略特研究的领域，也为我们审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新

思路。但这些研究有如下两个主要不足。第一，除了比尔对达尔文理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之外（她也主要从语言而不是理论内涵出发），几乎所有的其他评论都没有对他们所涉及的进化理论本身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做过比较明确的概括，而只是简单地将进化论当作现成的、众所周知的理论来使用。然而进化理论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诸多流派有时连理论出发点都大相径庭，不对这些思想进行基本梳理往往会导致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建立在这种理论框架之上的文本阅读先天不足。第二，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一两部作品上，没有从全局上把握爱略特的小说，不能从整体上揭示爱略特为什么以及如何对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接受和反思，进化论对她的写作到底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国内对爱略特的研究近三十年发展比较快，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叙事学、新历史主义、原型批评、伦理学、结构主义、决定论、文学符号学、消费主义和互文性等多方面对爱略特的小说进行了评说。但是这些研究有比较明显的重复性，对爱略特的宗教道德观、女性主义思想、人本宗教等方面讨论较多，几乎没有涉及爱略特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殷企平教授从“进步”话语的角度研究了《亚当·贝德》《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对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速度的思考，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过笔者认为，达尔文为“进步”观念“摇旗呐喊”（殷企平，2009：4）的观点值得商榷。深入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他的进化模式其实是对“进步”提出了质疑，而这种质疑也同样表现在爱略特的小说中。

维多利亚时代是剧烈变革的时代，长期以来统治人们思想的基督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时期的福音教派运动、牛津运动等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唤起人们对宗教的热情，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维多利亚人逐渐丧失对宗教的信仰，并且在道德层面上对宗教产生怀疑。以达尔文为例，这位科学家生长在开明的家庭，挚爱的父亲、兄弟和很多亲朋好友都并不笃信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解释，这些不信教的人都应该永久地被惩罚。对此，达尔文评论说：“这是个该死的教义。”（Gilmour，1996：90）尽管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然而他抛弃基督教信仰的直接原因据说是因为爱女的夭亡。眼看女儿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作为父亲的达尔文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要带走这个纯洁可爱的孩子，更无法想象这个孩子在死后还要受惩罚。这种思想使